

庭院深深

釣魚臺

我給江青 當秘書

楊銀祿◎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第 一 章	出乎意料的工作調動	
	汪東興找我談話.....	009
	初到釣魚台 11 號樓.....	012
	終於見到了江青.....	016
第 二 章	閻長貴蒙冤	
	一篇習作得到毛澤東的稱讚.....	020
	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秘書.....	021
	陳伯達、姚文元突至 11 號樓.....	023
	閻長貴因何獲罪.....	025
	閻長貴的監禁生活.....	028
第 三 章	江青的冷酷與無常	
	我接到“父病故速歸”的電報.....	030
	江青說：你父親去世是假的.....	032
	婚事帶給女護士的厄運.....	035
	小狗引發的冤案.....	041
	江青召開的組織生活會.....	045
	私設公堂驚動八位政治局委員.....	048
	江青的相面術.....	055
第 四 章	江青的生活方式	
	江青的一天.....	061
	難侍奉的江青.....	062
	江青的“四怕”.....	066
	隨心所欲的江青.....	072

	愛出風頭的江青.....	078
	江青的生活作風.....	086
第五章	江青的行為方式	
	附庸風雅又吝嗇.....	089
	江青的鎖骨斷了.....	092
	所謂棧橋事件、照相事件和高炮事件.....	098
	對鄧小平復出的態度.....	102
	在批判“二月逆流”中的作用.....	104
第六章	覬覦軍權插手軍隊	
	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112
	整黃永勝的真正意圖.....	114
	調動軍機看表演的背後.....	119
	擅自下達的作戰命令.....	121
第七章	江青與林彪的關係	
	請安問好與相互勾結.....	123
	《孜孜不倦》照片背後的故事.....	127
	江青給葉群開出的黑名單.....	132
	江青對林彪、葉群的戒心.....	135
	江青：我夢見死有餘辜的林彪了.....	138
第八章	江青的釣魚台	
	釣魚台居所的幾番變化.....	141
	釣魚台裡深挖洞.....	145
	防震架和轉移演練.....	146
	國賓館成了練車場.....	147
	異想天開建花房.....	150
	釣魚台的霸主.....	152
	陳永貴無意間得罪了江青.....	156

第九章	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	
	做好立即出發的一切準備	158
	初上廬山的閒情逸致	161
	江青誤闖毛澤東居處	162
	應對葉群時的兩面三刀	167
第十章	在批陳、批林運動中	
	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的批評	171
	葉群眼含淚水請求江青保護	173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	175
	利用“伍豪事件”攻擊周恩來	179
	蠻橫無理的醜態	182
	江青要我組織揭發林彪是如何迫害她的	185
第十一章	江青的政治野心	
	視若珍寶的一封信	189
	處心積慮擠入中央政治局	194
	常委夢的破滅	199
第十二章	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情況	
	互相吹捧，各有企圖	202
	七天六十多個小時的談話	204
	周總理指示：所有談話資料立即封存	209
第十三章	江青的另一面	
	把我的愛人調到北京	211
	叫程師傅給我做病號飯	216
	提倡婦女穿花衣服花裙子	219
	江青的三次流淚	222
	為人改名的嗜好	240

第十四章	江青的親情世界	
	關於江青與毛澤東的婚姻	249
	毛主席對江青的關心愛護	253
	毛主席不再圈閱江青送的參閱材料	255
	毛主席送江青五個玉米之謎	258
	毛澤東下令不許江青到他住處	260
	江青的姐姐李雲露	262
	江青的哥哥李干卿	265
	江青與毛岸英、毛岸青	268
	江青與李敏	271
	江青與李訥	274
	江青與毛遠新	288
第十五章	我是如何離開釣魚台的	
	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的四點共識	293
	江青：你們是用溫度害我	295
	要挾總理把我趕出釣魚台	300
	毛澤東：江青給你們戴帽子，我給你們摘	307
	毛主席安排我們去五七學校鍛煉	311
附錄一	我所接觸到的毛澤東	316
附錄二	難忘周總理的關懷	324
後記	334

第一章

出乎意料的工作調動

我出生於河北省定縣（現稱為定州市）一個普通的貧苦農民家庭。1957年，我19歲的時候，應徵入伍，成為中央警衛團的一名警衛戰士。1967年1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部要從中央警衛團挑選一兩名優秀的年輕幹部，到中央辦公廳主任值班室工作，我有幸被選中。1月6日，我被正式調到中央辦公廳主任值班室工作。雖然那裡任務繁重，責任重大，但我還是很快熟悉了情況，適應了新的工作。然而沒想到，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已經在等待著我了。

汪東興找我談話

1967年10月3日上午，天有些悶熱，我像往常一樣值班，一邊守候電話，一邊整理文件。大約11點鐘，突然接到汪東興的秘書高成堂的電話，叫我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要找我談話。

汪東興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也是我的上級領導。這麼高層次的領導找我這個極普通的基層幹部談甚麼呢？我有點摸不著頭腦。

下午3點，我懷著忐忑的心情來到汪東興的辦公樓。高成堂秘書在門口迎接我。高秘書長得很英俊，眉宇間透出幾分靈氣。他客客氣氣地把我引進會客廳，給我倒了一杯茶，讓我在此靜候，然後就出去了。大約一分鐘以後，汪東興同志來了。

汪東興中等身材，圓圓的臉，敏銳的目光裡夾帶著幾許興奮。他面帶笑容主動和我握手，和氣地問道：“你就是楊銀祿同志？”問完他坐在沙發上。

“是。”我緊張地站在一旁一動不動。

汪東興大概看出我緊張的心情，指了指他旁邊的一張沙發說：“請坐，請坐下來說話。”

等我坐定以後，他說：“經過組織上認真瞭解和研究，決定調你到江青同志身邊工作，給她當機要秘書。江青同志現在的秘書叫閻長貴，是個大學生，文化程度較高，會寫文章，是一個筆桿子，人很老實，江青同志想把他調到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去工作，發揮他的特長，所以叫你去接替他。請你準備一下，明天就到釣魚台11號樓去報到，我親自送你去，你明天上午10點鐘到我這裡來。”



1967年10月3日汪東興和楊銀祿的一次談話，改變了楊銀祿的命運。几十年後，那次談話成了二人往日歷史的談資。圖為2006年春節楊銀祿（右）看望汪東興時的合影。

我聽後驚在一旁，一時失語。

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是個地位顯赫、大紅大紫、影響極大的人物，像我這樣太過平凡的人到她那裡工作，真有些不可想像。於是，我忙推託說：“汪主任，我知道，秘書工作非常重要，特別是給江青同志當秘書要求就更高了，我的文化程度不高，這個工作我可幹不了，不能勝任呀！實在對不起，您還是另外物色人選吧。我從心底感謝您和組織的信任！”

老實說，自從參加工作以來，這是我第一次對領導分配的工作說“不”字，覺得很不好意思，我也知道這樣說領導是不會高興的，但我還是鼓起勇氣把這些話說了出來。我這是對工作負責，對領導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

汪東興聽了以後，不但沒有表示出驚訝和不高興，反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銀祿同志，你知道嗎？你是從很多幹部中精心挑選出來的，你的直接領導相信你會幹好這項工作，我們也信任你，你一定會勝任這項工作。調你給江青同志當秘書的事，我是親自報告了主席的。主席明確表示：調中央警衛團的同志幹秘書工作，當江青的秘書，我信得過，我放心。況且，我已把你的介紹材料和照片，送江青同志看過，她也同意你去。如果你不去的話，我不就為難了嗎？”

汪東興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你還是去。去了以後，主要任務是收收發發，管理文件，不會讓你做文字工作，文字的東西有人搞，中央文革小組裡會寫作的人有的是，你不要發憊！你去試一試，積極工作，認真負責，盡快適應那裡的環境，適應工作，幹好了就幹下去，實在不行的話，你再回中央警衛團工作。”

汪東興的話，我覺得是通情達理的，但是，我還是不敢擔任如此重要的工作，楞在那裡，既不點頭，也沒搖頭。汪東興看出我還是沒有完全想通，又進一步開導我說：“組織上決定叫你做一項你從來沒有做過的工作，你心裡確實沒有底，發憊，這我是可以理解的。當你對這項工作有了實踐，對它瞭解了，熟悉了，也就得心應手了。常言道：熟能生巧嘛！今天的事就這樣

決定了，你看怎麼樣？”

聽了汪東興的這番開導，我想：汪主任工作很忙，用了這麼長的時間做我的思想工作，還把我這樣一個普通幹部工作調動的小事，報告了毛主席，主席這麼信任，我感到無尚光榮和自豪！何況，組織上還允諾：幹好了就幹下去，不行的話再回中央警衛團工作。於是，我的思想有了轉變。我想，按照組織原則，應該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我是個軍人，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這樣，我就答應下來了。

我說：“感謝汪主任對我的耐心解釋，感謝毛主席和各級組織對我的信任。我去了以後一定好好工作，認真辦事，決不辜負組織對我的希望，請領導放心！”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江青那裡，一去就是五六年的時間。在此期間，我過著夢魘般的生活。

初到釣魚台11號樓

1967年10月4日11時左右，我由汪東興和他的秘書高成堂陪同，乘坐他的紅旗轎車，來到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釣魚台，昔日為帝王遊樂休息的行宮，是北京著名的園林之一，迄今已有800年的歷史。從金代章宗皇帝（1190—1208）在此建造“萬柳堂”別墅開始，它就成為盛極一時的遊覽地。明代，這裡是皇帝的別墅，清代乾隆皇帝在此修建了望海樓，並親筆題詩立匾。1958年，為了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進行了大規模修建，建成著名的國賓館。釣魚台國賓館，是中國政治、經濟、外交活動的重要場所，由一座座幽靜高雅的園林別墅式建築群組成。園內甬路彎彎，樹木蔥蔥。小橋宛轉，湖面波光粼粼，荷葉田田。沿湖16座別墅中的每一幢樓房的周圍都是百花爭艷，鳥語聲聲。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辦事機構設在釣魚台國賓館，先是15號樓，後搬到11號樓，不久就固定在16號樓。陳伯達、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陸續搬進這裡辦公和居住，陳伯達住15號樓，江青住5號樓。

5號樓位於釣魚台的東北角，在江青住進前，周總理曾在5號樓工作和休息過。江青進住5號樓是周總理親自安排的。江青患有比較嚴重的植物神經失調病症，對聲音特別敏感。1966年底，她覺得5號樓距離釣魚台圍牆外的馬路太近，車來人往的不夠安靜，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經過認真挑選，她選中了11號樓，很快就搬了過去。11號樓距離馬路較遠，周圍環境也較幽靜。它的東南邊12號樓，是毛主席辦公和休息的樓，但他很少到那裡工作和休息；正南邊是一個小湖，西邊的玉淵潭公園，為了釣魚台的安全早已關閉；西北邊是10號樓，沒有住人；北邊是一片很大的綠地，東邊是14號樓，距離11號樓較遠。對江青來說，11號樓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住處。

汪東興的汽車駛入釣魚台東門，過了一座小橋，往南拐彎後行駛了近200米，再往西拐了約100米，再往南拐，就到了一座乳白色的二層樓前。這就是釣魚台11號樓。

一進樓門，汪東興就小聲對我說：“江青同志就在這裡休息和辦公，她現在還是在睡覺的時間，你今後說話時聲音要小些，走路要輕些，江青同志



釣魚台 11 號樓，江青選中的比較理想的住處。她在此處居住、辦公有一年半的時間。(柏春 攝)

神經衰弱，休息不好，特別怕聲音。”

他說著就徑直把我帶到一層江青的秘書閻長貴同志的辦公室裡。閻長貴剛剛起床，被子還沒有來得及疊，看見我們來了，揉了揉疲倦的眼睛，對汪東興說：“汪主任來了。”

汪東興指著我對閻長貴說：“這就是楊銀祿同志，今天我把他帶來了，請你首先把這裡的情況和要注意的問題以及需要他做的工作向他好好介紹一下，江青同志起床以後，你把楊銀祿同志介紹給她，有甚麼事，你再打電話告訴我。從今天起，你們就在一起共事了，你要抓緊時間帶他，使他盡快熟悉情況，熟悉工作。”說完，他就跟我們點點頭走了。

閻長貴當時的年齡只有30歲，但是，看上去像40歲左右的人。他的個子不算高，背有點駝，面色憔悴，雙眼佈滿了血絲，眼角還殘留著眼屎，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無精打采地掛在鼻樑上，看樣子有很多日子沒有休息好了。

閻長貴一邊打著長長的哈欠，一邊用嘶啞的嗓音對我說：“已經知道你的大名了，歡迎老楊來這裡工作。我早就盼你來了，你來了，我很高興。”

他打量了我一下，開玩笑地說，“你挺精神，挺精幹的嘛。比我年輕得多嘛。”

我問他：“你今年多大了？”

他伸了伸三個手指頭：“老了，30歲了。”

“你才比我大一歲，咱們基本是同歲。”我說。

我們倆寒暄了一會兒，他對我說：“江青同志身體不太好，據說是植物神經紊亂，特別怕聲音，還怕見生人，一聽到聲音，見到生人，就精神緊張，出虛汗，發脾氣。咱們在樓裡說話、走路、開關門窗等各種動作都要特別輕，千萬要注意。你在短時間之內先別見她，盡量躲著她，如果實在躲不開了，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壞了。她不跟你說話，你別主動跟她說話。今天我不跟你說得太深了，以後你慢慢體會吧。你先在我這裡熟悉熟悉情況，和我一起整整文件，等她主動要求見你的時候，我再帶你去見她。”

聽了閻秘書的情況介紹，我覺得這裡比想像的還要神秘，心情又緊張起

來。由於精神緊張不安，所以，我一天一夜沒有敢出閻秘書的辦公室。

第二天10點鐘，在屋裡憋了二十多小時的我，小心翼翼地走出辦公室，來到走廊。見沒有動靜，我又來到門廳，仔細觀看這裡高大的門窗，巨大華麗的吊燈，厚厚的純毛地毯，平緩彎弓式的樓梯。這一切對我這個土包子來說，都覺得新鮮。我正在觀賞樓內設施的時候，一位女同志輕足慢步地向我走來，她小聲問道：“你是剛剛來的秘書同志吧？”

我說：“是。”

“請你馬上就回你的辦公室。”

她怕我不理解，笑咪咪地解釋說：“江青同志快要起床了，她起床以後，有時看一會兒文件就出來散步，也有時起床以後，就出來散步。她特別怕見生人，如果你現在被她看見就麻煩了。”

她很客氣地問我：“你姓楊吧？歡迎你來這裡和我們一起工作。”

我問：“你貴姓？”

她說：“免貴姓許，叫許春華，做護士工作。”

我不敢在門廳久留，聽了小許的話，自然就想起了昨天汪東興和閻長貴的提醒。閻長貴說：“一跑就壞了”；小許說：“看見就麻煩了”。我深深感覺到這兩句話的分量。他們的提醒，對我這樣一個初來乍到的人是愛護，我非常感謝他們。

一個偌大的門廳，一條寬大長長的走廊，我除見到小許以外，沒有見到任何一個人。這裡一丁點聲音也沒有，寂靜得可怕。我聽了小許同志的提醒，悄悄地回到閻秘書的辦公室。

人有一種好奇的心理，越覺得可怕和神秘，就越想看個究竟。到了中午12時左右，我聽到電鈴聲，就走到閻秘書的辦公室門口探頭探腦。我看見有八九個人從各自的寢室迅速而輕捷地走出來，有的拉開窗簾，打開窗子通風換空氣，有的打掃衛生，有的匆匆跑到室外看風向、測風力、量氣溫，有的端飯送水。閻秘書把早已準備好的文件、資料送到二樓江青的辦公室。我發現大家的工作是那樣認真、緊張、小心翼翼和有條不紊。

警衛參謀孫占龍知道我調到11號樓來工作，特意到閻秘書的辦公室來看望我，我們兩個久別重逢，高興得很，四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我激動地說：“孫參謀，我有很長時間沒有見到你了，不知道你到哪裡去了，沒有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你。你現在可好哇？”我在神秘莫測的11號樓見到久別重逢的老領導、老戰友，激動得竟然忘了這裡的清規戒律，說話的聲音還是和在部隊時一樣粗聲大氣。

孫參謀沒有回答我的問話，而是趕緊捂住我的嘴，嚴肅而小聲地對我說：“你說話的聲音可要小點呀，千萬別這樣大聲，今天咱們幸虧在屋裡，又關著門，如果在走廊和門廳裡，說話聲音這麼大，你可就倒霉了！閻秘書沒向你介紹這裡需要注意的問題嗎？”

孫參謀的話，顯然是對我的進一步提醒，也是對我的善意批評。他怕我不理解，又滿面笑容地對我解釋說：“你剛剛來這裡工作，有很多情況和問題你不瞭解，也不理解。一是你還不懂得這裡的規矩；二是你不知道說話、動作大小的利害關係；三是你還不習慣在這裡工作和生活。我沒有責怪你的意思，只是提個醒，不要緊張，以後注意鍛煉，養成習慣就好了。我現在不能在這兒待久了，我得到門廳做準備，江青同志很快就要散步了，以後有時間再聊吧。”

一天下來，我被這裡極其嚴肅、緊張、神秘的氣氛籠罩著，真有些透不過氣來，本來緊張的心情就更加緊張起來了。從這天起，我除了到釣魚台機關食堂吃飯以外，很少走出自己的辦公室，整天關在辦公室裡看文件，選資料，清理登記，收收發發，不敢出門越雷池一步，怕招來甚麼災禍。

終於見到了江青

“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由於身體欠佳，很少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我調到江青處之前，在中央警衛團已經工作了10年之久，還從來沒有見過江青，也不知道她長得甚麼樣子，“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也只是在電影、電視、報

刊上看到過她的形象，至於她的脾氣、性格以及人品，我就更不瞭解了。

過了一段時間，由於我在11號樓待的時間稍稍長一點了，基本上掌握了江青的活動規律，我就主動幫助同志們幹點服務工作。

1967年10月25日13時左右，我正在大客廳開窗戶通風換空氣，一回頭，突然看見江青由一位護士攙扶著從二樓樓梯上緩慢地往下走。她走到拐彎處，在一把扶手軟椅上坐了大約一分鐘的時間，繼續移步往下走。大客廳的門，正好對著樓梯，我實在無法躲開了，就只好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靜靜地站在那裡耐心等待江青快點走出樓門，連大氣都不敢喘，唯恐江青看見和聽見（這次不是正面相見）。

江青無精打采地只注意腳下的樓梯台階，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下樓以後，警衛員孫占龍把早已準備好的軍帽遞給她。她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把小木梳子，梳理了一下頭髮，戴上軍帽，兩隻胳膊伸向後邊，警衛員幫助她穿上夾大衣，又遞給她一塊頭巾，她自己包好以後，服務員給她開大門，就由警衛員陪同散步去了。

由於我的心情特別緊張，所以對江青的形象沒有看得很清楚。

我到11號樓已經三個多月了，還沒有正面見過江青，說出來或許沒有人相信，不過，這是真的。直到閻秘書離開11號樓^①的第二天，我才真正看清了江青的樣子。

那天下午2時許，江青打鈴叫秘書。閻秘書走了，只有我去見江青了。

我膽戰心驚地走進她的辦公室。一進門，我看到江青仰坐在沙發上，兩腳和小腿搭在一個軟腳墊上，無精打采地看文件。她聽到有人進來，臃腫的眼皮抬都沒有抬一下，就問道：“你就是楊銀祿同志吧？來了一段時間了吧？”

“是，我叫楊銀祿，已經來了三個多月了。”我的心情雖然緊張，但還是保持了部隊時的習慣，乾脆利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問。

“你是從中央警衛團調到我這裡的吧？”江青又問。

① 關於閻長貴離開11號樓的情況，將在下一章詳細敘述。

“對，是從警衛團調來的。”

這時，她抬起頭，睜大眼睛瞪了我幾眼，不滿意地說：“你不能站著跟我說話，你跟我說話的時候，你的頭不能高於我的頭，我坐著，你就應該蹲下來跟我說話。這點規矩他們沒有告訴你？”

說實在的，我還真不曉得這點規矩，但是，我可不能說他們沒有告訴我呀。我忙說：“江青同志，今後我注意。”

接著，我就按照她的規矩蹲在她的左前方，和她相距只有一米左右。

江青說：“閻長貴這個人有問題，他是從《紅旗》雜誌社調來的，和關鋒（已經於1967年8月30日被隔離審查）是一個單位的，我懷疑他和戚本禹（剛剛被隔離審查）是一夥的，這是我憑直覺得出來的結論，你可能不信，但是我信，因為我的鬥爭經驗很豐富。閻長貴看樣子很老實，實際上卻不然，心眼多得很。”

江青又問：“現在你對工作熟悉了沒有？你應該盡快熟悉工作，不能因為你的到來，干擾了我的工作，使黨的工作受到損失。我的工作是和黨的工作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你的責任可不小哇！”

我很莊重地說：“我會努力的，盡快熟悉本職業務。”

我期待著江青滿意的微笑，沒想到江青聽了我的表態，很生氣地說：“我今天原諒你，因為你剛來，還不瞭解我的習慣，以後不允許你這樣跟我說話。你說話的聲音那樣高，速度那樣快，像放機關槍似的，使我感到頭疼，使我出汗。如果由於你說話不注意音量和音頻，把我搞病了，你的責任可就大了。”說著，就指了指她的額頭，大聲說，“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這時，我有意壓低聲音說：“請你原諒，我今後一定注意說話的聲音和速度。”

江青皺著眉頭，拉著長音，大聲而不耐煩地問道：“你在說甚麼？我怎麼沒有聽清楚，你說話的聲音又太小了，如果我聽不清你說的是甚麼，心情也會緊張，也會著急出汗，你懂嗎？”

我想說“好”，可她沒有等我說出來，就急忙說“好好好”，擺手叫我趕快出去。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再說甚麼也是多餘的，只好按照她的指令站起來準備往外走。

由於我蹲得時間太長了，雙腳麻木得不能走路。我慢慢拎著腳、非常艱難地挪到一旁，想稍稍歇一下再走。這時，江青說要出去散步，她站起身在護士的陪同下慢慢向外走去。

到現在，我總算仔仔細細看清了江青的樣子。她有一頭烏黑錚亮厚厚的頭髮，男式背頭髮型，梳理得很利落。我那時的年齡才剛剛30歲，就有了一絲絲的白髮，看到江青依然一頭烏絲真是讓我羨慕。^①她五官端正，鼻樑高直，雙眼皮，大眼睛。臉上的皮膚細潤光滑，沒有一絲皺紋，只是鼻尖右側長有一個褐色小痣。她的身材修長（後來聽醫生說她身高1.66米），不胖不瘦，雙手皮膚白皙，手指細長，一看就知道她沒有幹過重體力勞動，而且保養得很好。53歲的人了，腰不彎，背不駝，身子挺拔，穿著一身綠軍裝，顯得大方而得體。走起路來姿勢也十分優雅，真是難得！總的印象是既高傲，又高貴。

對於從來沒有見過江青或者說從來沒有這樣近距離地見過江青的我來說，雖然捱了訓斥，心情緊張了一陣又一陣，但還是有收穫的。因為我終於與這樣一個大人物有了一次面對面的“談話”。

① 在江青身邊工作時間長了以後，有一次，她跟我談起如何保養身體的事。她問我：“你知道不知道為甚麼你年紀輕輕的就有了白頭髮？”我說：“不知道。”她說：“你這是少白頭，是遺傳，你父親肯定是早就花白頭了。”我說：“對的。”她說：“我的母親頭髮特別好，又厚又黑，到年齡很大了也沒有白髮。我有一個保護頭髮的方法，長期堅持很有效果。我長期用木梳梳理頭髮。先順著梳，梳若干次；再鉞著梳，梳若干次。梳得頭皮發熱為止。一天可以梳若干次。這樣可以增強血液循環，起到增髮、護髮的作用。不信，你試一試。”

第二章

閻長貴蒙冤

我到江青身邊工作之前，江青的秘書是閻長貴。上文提到，江青在跟我的第一次談話時就對我說：“閻長貴這個人有問題，看樣子很老實，實際上卻不然，心眼多得很。”那麼，閻長貴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他又是怎麼獲罪於江青的呢？

一篇習作得到毛澤東的稱讚

閻長貴的祖祖輩輩都是貧苦農民，解放以後，他有了上學的機會，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學生出身。1956年高中畢業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196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現在的《求是》雜誌社）工作。但是閻長貴並沒有做編輯，而是師從中國哲學史家關鋒，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剛大學畢業一年多的閻長貴，曾因一篇文章而聲名鵲起，他根據華君武先生的漫畫《無題》寫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發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國青年報》上，文章主要批評了那種“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處世哲學。這篇習作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榮譽。《中國青年報》約他開座談會，文章被收錄進1963年出版的《報刊評論選》，還有人寫文章評價和分析這篇文章。當時閻長貴對這篇習作受到如此高的禮遇一直心存疑問，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訴他：毛主席稱讚和表揚過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並作了批示。30年後，他在

一套中共中央文件彙編中看到了毛主席對這篇文章的批語：“印發各同志研究。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語，這在當時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這無疑對他以後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秘書

閻長貴做了兩年多學術研究，1963年秋進入《紅旗》雜誌社的“哲學反修”寫作小組，小組由關鋒負責。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還沒寫出來，“四清”運動開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至此，閻長貴的學術研究被迫終止。他坦誠地說，當時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熱情很高也很積極，認為奪取政權沒趕上，但保衛政權可不能落後，所以緊跟形勢和輿論，說過錯話，做過錯事，但在當時認為都是對的。1966年6月，閻長貴被戚本禹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搞信訪工作，一個月後又被調到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緊接著被分配專門負責江青的群眾來信。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沒人給江青寫信，江青也沒有專職秘書；但“文革”開始後，江青擔任了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一些群眾給她寫信，一開始每天幾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門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群眾來信急劇增多，幾百封，上千封，後來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裝，七八個人都處理不過來。為此專門成立了江青辦信組，閻長貴任組長，直接由戚本禹領導。閻長貴每天挑選七八封或十餘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給江青，其餘的絕大部分轉給了有關部門：國務院、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部委，揭發和批判江青的，則作為“反革命信件”轉給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對閻長貴說：“江青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太粗，我看你還比較細，你去吧。”半個月後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對閻長貴說：“跟我走，現在你就去11樓！”當時江青住在釣魚台11號樓，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讓閻長貴去給江青當秘書。其實選中閻長貴給江青

當秘書並非這麼簡單，當時有好幾個人選，但最後選定資歷最淺、年紀最輕的閻長貴可能有幾個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有一定辦事、寫作能力，他所寫的文章得到過毛主席的讚揚；二是閻長貴當時和江青的女兒李訥接觸比較多，很談得來，李訥對閻長貴的印象不錯，她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是關鍵的恐怕還是戚本禹的推薦，江青當時信任戚本禹超過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說王力和關鋒了。

1967年1月9日，閻長貴正式當上了江青的秘書，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專職秘書。儘管當秘書前閻長貴經常見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氣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閻長貴當了秘書以後，江青很長時間不見他，見了面也愛答不理，送給江青的文件都是通過警衛員傳遞。閻長貴很納悶，別人告訴他，這叫試用階段。二十多天以後，江青才找閻長貴進行第一次談話。起因是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幹部分兩派，汪東興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認為自



江青在“文革”期間的四任秘書。左起：第三任秘書劉真，第一任秘書閻長貴，第二任秘書楊銀祿，第四任秘書劉玉庭。

已支持的這派受壓，想讓江青為這派說話。戚本禹派閻長貴去“調查”，然後寫個報告。閻長貴“調查”回來後，給江青和戚本禹寫了一封信，信的抬頭是：“本禹同志並江青同志”，內容當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後說：“這事我不管！”閻長貴馬上爭辯道：“‘調查’是你讓去的，你怎麼不管呢？”戚本禹接著說：“你敢不敢把這封信送給江青？”閻長貴當時年輕氣盛，隨口就說：“那有甚麼不敢的！”於是，閻長貴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將信重抄一遍，通過警衛員送給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閻長貴找去，對他說：“你的信我看了，但這件事你不要管了，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裡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務都不要再接受，你要對我負責，對黨負責。”另外，她還講了一些做秘書的紀律。

從這件事以後，閻長貴開始每天直接給江青送文件，處理信件，做一些事務性的工作。江青曾對閻長貴說：“我完全是個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此後，閻長貴每天送文件時，都要附上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幾。

陳伯達、姚文元突至11號樓

1968年1月9日下午2點左右，江青剛剛離開釣魚台11號樓，當時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成員姚文元突然來到11號樓，找閻長貴和我談話。

陳伯達、姚文元進入大客廳就坐在南邊的沙發上。閻長貴和我走進大客廳以後，看到他們兩位的面容很嚴肅，不敢坐下，站在他們面前等待他們說話。

“你們二位坐下，別站著，站著不好說話。”陳伯達操著濃重的閩南口音首先開口講話。

坐在我們面前的是當時不可一世的兩位大人物，我們小心翼翼地坐在他們西邊的沙發上。

這時，陳伯達提高了嗓門說：“你們坐在旁邊不好講話，快坐到我們對面。”我們立即起身坐到北面的沙發上。

陳伯達繼續說：“有一項很重要的任務需要閻長貴出一次差，秘書工作暫由楊銀祿同志接過來。由於時間緊迫，交接工作越快越好，一分鐘也不能耽擱，還要求交接清楚，不能出任何差錯。”

姚文元說：“伯達同志講的，你們二位聽懂了沒有？”

“聽懂了，一定按照首長的要求辦。”我們倆異口同聲地回答。

“你們二位的工作交接完了以後，立即報告我們。”陳伯達補充說。

陳伯達不露聲色，講話時表情比較平和。姚文元眨巴著一雙大眼睛，講話時表情不太自然。他說：“伯達同志講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多解釋甚麼，抓緊交接文件，我們到16號樓等著你們。”他們向我們倆交代了以後就走了。

我們那時畢竟年紀還輕，缺乏經驗，誰也沒有感覺到他們的講話有甚麼問題，也沒有懷疑兩位要人親臨11號樓找我們談話的舉動意味著甚麼。閻長貴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緊張的情緒，還真以為派他去出差呢。交接文件時還和平日一樣認真細緻，一絲不苟。

他首先把我帶到江青的辦公室清理文件，他讀題目和文號，我登記，一份一份地搞得很清楚，生怕搞亂了，將來說不清。江青辦公室的文件不算多，大約半個小時就登記完了。然後，我們回到秘書辦公室繼續清理登記文件。

秘書辦公室的文件雖然比較多，但是，我們還是認認真真地一件一件地詳細清理登記，絲毫不敢馬虎。大概還沒有登記到十分之一，江青的警衛員孫占龍從外邊打電話到樓廳值班室，叫我接電話。我拿起電話聽到老孫說：“江青同志叫我問一下文件交接完了沒有。她叫你們抓緊時間，快一點交接，越快越好。”

我回話說：“老闆出差辦事還回來，交接文件幹甚麼，多麻煩。”

老孫說：“咱們不是有一條老規矩嘛，知道的不說，不知道的不問嘛。我也不知道為甚麼交接文件，叫你們交接就交接，叫你們快點就快點就是了，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又過了半個小時，老孫又來電話催促說：“江青叫我再催你們快點交接，她說她等得不耐煩了。”

我說：“請你報告江青同志，我們再加快點速度。”

我接了老孫第二次電話以後，就下意識地感到有甚麼問題了，為甚麼一再催促交接工作，快點再快點，這是怎麼回事呢？

老孫第三次來電話說：“江青同志說你們別交接了，她說閻長貴不離開11號樓她就不回去，今天究竟發生甚麼事，等一會兒就明白了。”

我剛剛放下電話，就看見從外邊進來一位部隊的幹部，直奔秘書辦公室，接著我看見他把閻長貴帶走了。這時，我才發現外邊還有幾名戰士，氣氛十分緊張。

閻長貴走得很急促，因為說是叫他出差，沒有交他辦公室房門的鑰匙，後來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狀。江青說他私自帶走鑰匙是有企圖的。

那麼，閻長貴被帶到哪裡去了？後來，我聽說那天閻長貴被帶到釣魚台20號樓隔離審查了。又過了一段時間，聽說把他押走了。究竟送到哪裡去了，我當時並不知道。

閻長貴因何獲罪

後來我才知道，江青最終不信任閻長貴，導火線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鈴一時沒找到閻長貴，別人告訴閻長貴後，他馬上跑去，江青對他大發脾氣：“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你現在在我這裡，我承擔了多大壓力呀！你還懵懵懂懂，別人說你甚麼我都不信，為甚麼別人說我你都信。”閻長貴被她的這番話弄得摸不著頭腦，但“別人說你甚麼我都不信”這句話閻長貴心裡清楚。那是1967年8月關鋒倒台後，因與關鋒的師生關係，閻長貴受到了一些衝擊，《紅旗》雜誌社及一些單位也有人貼閻長貴的大字報說：關鋒是反革命，閻長貴也是反革命，因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在江青同志身邊我們不放心，等等。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快報》上有不少這類反映，閻長貴把這些情況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江青，江青說：“跟關鋒在一起，關鋒的學生不一定是壞人。”